

收稿日期:2026-05-01

城市景观与文化意蕴:论邱华栋的北京书写

毕海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邱华栋自199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书写,最突出的贡献是叙述了现代都市视野中的“新北京”和“新北京人”。从北京都市奇观的缤纷呈现,到对北京历史文化的系统审视,邱华栋通过近三十年的北京书写,系统形塑了时代变迁中的北京城市“肖像”,完成了对北京文化意蕴的整体性叙事。邱华栋是城市景观的描述者,更是表达和思考北京文化的哲人。

关键词:邱华栋;城市景观;文化意蕴;北京书写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6)05-0108-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百年民族神话传说故事绘本研究”(21BZW182)。

作者简介:毕海(1979—),男,湖北浠水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6.05.012

1990年代北京文学最突出的特征是城市文学的兴起。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转型加速,北京的城市化进程也日趋明显。突飞猛进的城市化不仅带来城市空间的扩张和城市人口的膨胀,更促使城市内在结构和文化系统急速向现代转型。1980年代“京味”文学更多表现为传统北京的叙述和老北京风俗民情的书写,而1990年代的北京文学开始发生显著变化,作家们对日益僵化和程序化的既有北京形象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厌倦甚至是拒绝。于是,表现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北京城市景观,成为作家不约而同的写作选择。其中最为典型、成就最高的作家无疑是邱华栋。

陈晓明曾指出,“就当代中国城市小说而言,王朔和邱华栋或许是两个真正具有城市感觉的人”,但“不管是王朔还是其他任何作家,没有人像邱华栋这样在小说中大量运用城市代码,他高频率地描写城市外表,那些豪华的宾馆写字楼、光怪陆离的卡拉OK舞厅酒吧按摩院、混乱的人流、蛮横的立交桥、庞大的体育场、午夜的街道、囚笼一样的公寓等,这使得邱华栋的小说始终披着一件绚丽的外衣。这并不是简单地对城市外表进行环境描写,这些显著的城市外表本身构成了小说叙事的中心环节,构成了小说审美意趣的主导部分,就像19世纪的浪漫派文学对大自然的描写一样,没有这些关于自然景致的描写,浪漫派的作品几乎难以独树一帜。对邱华栋来说,这些城市外表既是他的那些平面人生存的外在的他者,又是此在的精神栖息地”^{[1]1-4}。在述评邱

华栋1990年代文学成绩时,陈晓明甚至不无夸张地说道,“多少年之后,当北京变得更加面目全非,我们也许要通过邱华栋的小说来回忆那已经消失的城市风景了”^{[1]1-4}。作家毕飞宇也认为邱华栋“是写城市的一个高手”,觉得“他基本上是一个城市文学作家”^[2]。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将邱华栋视作书写城市的圣手,就源于其对当代北京城市景观的细致描绘。实际上,作为一位创作时长超过30年,同时涉及诗歌、散文、小说多种体裁,写过历史、现实等不同题材的作家,邱华栋的创作极为丰富。在当代文学史上,邱华栋一度被视为“新生代作家”群体的代表之一,但倘若以长时段的文学史眼光观照,“在一些带有文学史建构意义的选本中,邱华栋最受关注或者说被评论家和文学史家认为最能代表其文学贡献的,还是他的那些城市题材中短篇小说”^[3]。邱华栋年少成名,早早闯入当代文坛,年少轻狂的他生活在北京,与城市共同成长,把1990年代的北京城视为观察和审视现代生活的最佳空间,“我生活在城市中,我的朋友以及很多人都生活在城市中,我便把写作的视点放在以城市为背景了”^[4]。一开始,书写城市北京或许源自生存现实和生活经验,但随着写作的深入,对北京都市景观和文化形态的叙述逐渐成为邱华栋自觉的创作意识:“我更关注的是大厦里的思想与灵魂,更深地关注在大厦里走动的人的心灵。我要表现这些都市焦虑的灵魂。”^[5]至此,当代中国文学和北京文学也就有了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作家。通过邱华栋的文学书写,可以看到1990年代以来北京城市的“肖像”,从他一系列的都市景观和人物命运变迁的叙述中,更可窥视北京城市文化发展的基本面貌和内在精神。

一、邱华栋作品中的北京城市景观书写

邱华栋在回顾自己的创作时,曾明确表述自己写作的基本背景:

1992年以来的五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积累的能量大量释放的五年,这种能量都是在城市中释放的,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中国社会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商业社会。当然,中国社会的现实也是一种叠加的现实,后农业、工业和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景象重叠着,再也不是单一的农业社会与农业国度了。这种社会现实仍在分化与裂变,因而也造成了社会利益分层与社会群落的分化,因而,当代文学便演化成了当代的美学多元的丰富景观。^[4]

这篇创作谈讲述了作家写作的背景,也说明了文学创作与时代的紧密关系,更重要的是,它涉及了作家创作的内容——北京城市转型、都市文化发展等一系列重要范畴。如果说,1980年代中国社会依然处在从革命集体主义时代向市场经济时代转型的起步阶段,那么,到了1990年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真正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邱华栋恰逢其时,开始捕捉城市化加速的显在特征。邱华栋对北京各种现代景观细致描摹,“足够耐心又不惜篇幅,时常让人担心他流连光景而不能自拔”^[6]。城市景观书写真正进入作家的视域之中,构成了全新的视觉对象和认知方式。

刘大先认为,邱华栋是中国作家中最早对德波提出的现代“景观社会”有着直觉感受并明确表达的作家,注意到1990年代的北京日益被技术、金钱和媒体等因素所改造,形成一种新型的“人—物”关系^[7]。恰如德波所指出的:“景观就是这个时刻,这时的商品已经成功地实现对社会生活的全部占领。不仅景观与商品的关系清晰无疑,而且人们只能看到这个关系:人们看到的世界就是景观的世界。”^{[8]22}在早期的长篇小说《城市战车》中,邱华栋毫不掩饰表达了对城市的关切,作品的主人公与其说是一群“漫游”北京的落魄艺术家,不如说是作为“生长体”的城市本身。小说以深情的眼光凝视着城市:

城市其实一直就躺在那里,躺在祖国北方大地金黄的肚皮上,它一直就呆在那里,自己已经转动了两千年。它一直就是一条河流,或者是一个巨大的轮盘,上演着生者与死者的人生

戏剧,它早就开始了它的历史,而我到今天才悟到这座城市超越时空的美与魅力以及它真正的面貌与意图,我真正地凝视着早晨的城市。^{[9]284}

不难发现,与以前描述北京的作品不同,邱华栋的小说不再关注作为历史都城的北京的城市符号,如故宫、颐和园、长城等,不再关注作为政治形态的北京,而是将主要的视点放置在新的现代都市化空间和作为城市景观的北京风貌。

首先,邱华栋以奇观化的叙述,聚焦全新的北京地理格局和文化空间。邱华栋的城市小说频繁使用鱼群、飞鸟、蚂蚁、沙盘、水流等典型的涌现集群,呈现出现代都市的流动性和快速变化性。有研究者认为,邱华栋1990年代的北京故事相对北京的气质明显是“超前的”与“违和的”,但却“想象性地被认为缝合了1990年代中期与1930年代上海都市文化和文学的断裂”^[10]。邱华栋写的虽然是北京,但赓续的却是1930年代上海“新感觉派”的都市文学传统。然而与“新感觉派”不同的是,邱华栋小说中流动的风景与其书写的特定城市空间密切相连。邱华栋笔下最为常见的城市空间是北京东三环周边的城市空间,围绕着使馆区、国贸、现代饭店等构成的消费中心,这里是商业化北京的代表,可以说,邱华栋改写了北京的城市空间,将北京的城市书写从二环中心(老城)向东转移,建构出全新的城市空间。例如,邱华栋小说《手上的星光》广为研究者所引用的有关城市景观的叙述,“有时候我们驱车从长安街向建国门外方向飞驰,那一座座雄伟的大厦——国际饭店、海关大厦、凯莱大酒店等——闪过眼帘”^{[11]2}。身边快速掠过的各式建筑,甚至会让人在惊叹中暂时忘却自己。在小说《花儿花》中,作家借主人公马达之口明确表达了其所关注的城市景观范围及内容:“亮马河地区是当代北京一个最逼真和浓缩的景观,社会分层从大官大款大腕到高级欢场女郎以及低级站街女、民工,这里的生存景象的多层和多种空间以及它的国际化,都是最有代表性的了。”^[12]这多个层面之间,不同景观分割并立,不同人群恪守边界又相互纠缠游动。与城市地理空间改写相伴随的是城市文化心理的巨大变动,北京不再是稳固的、沉闷的、古典的、厚实的传统积淀的古中国代表,而是全新的都市生活体验和瞬时的心理感受。在《城市中的马群》中,北京在主人公的眼中是“不真实”的高楼大厦,拥挤眩晕但同时又带来全新的自由气息:“这座城市非常大,像一大堆骤然生长出来的雨后的蘑菇一样不真实。那么多高楼大厦,那么多立交桥,那么多人像蚂蚁一样涌现和消失。”^{[13]459}庞杂的都市物象给身处其间的个人带来了巨大的身心冲击。

邱华栋的城市景观叙述杂糅了写实和比喻,不仅城市的外观变得更加形象具体,其内在表征的宏阔和对人的压迫也溢出笔端:“城市显得那么不真实,在白天,它漂浮在尘土之上,面目不清又壁垒森严,像一张巨嘴吞吃着空气、飞机、汽车、植物和道路,在夜间,它又虎视眈眈,准备随时咬死每一个在睡梦中跌倒的人。”^{[13]441}不难看出,邱华栋对北京城市地理空间分布有着明确的意识,他更关切位于北京东三环北边的现代化的建筑群及隐匿其间的消费城市风景线,而新的城市空间又必然带来不同的城市心理体验和文化形态,由此形成了立体的城市文化景观。

其次,城市景观叙述往往带有极强的象征性,并关涉明确的文化隐喻,表达出对北京的情感倾向。邱华栋经常在小说中罗列都市中种种声光色电的物质形态:星级大饭店、美食菜肴、超级市场、购物中心、娱乐设施、假面舞会等,“整座城市也许并不是他们的敌人,只是一个祭坛,在这个祭坛上,物是唯一被崇拜的宗教,人们为了物而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个祭坛”^[14]。迈克·费瑟斯通曾论述过消费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及其特征,“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这一切,都是消费文化所强调的内容”^[15]。邱华栋也曾说:“像我在写作时,就非常注意用具有1990年代城市标志的一些细节来填充作品,比如大饭店中各种美食的名称,各种流行的汽车牌号,各种流行摇滚音乐,以及别墅中

各种设施,都在我的作品中予以凸现,我想我得以我的作品保留下1990年代城市青年文化的一些标志性‘符号’。”^[16]不难发现,邱华栋笔下的北京,是由耸立的高楼大厦和飞驰的名牌汽车等构成的物化世界。邱华栋对城市景观和物象的描述往往是客观的,在平静繁复叙述笔调背后甚至有一些欣赏的认同,但面对几近失控的光怪陆离镜像,秉承人文精神知识者的立场,叙事者也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质疑,这就形成了邱华栋城市叙述丰满而矛盾的情感态度和叙事伦理。

在描述物质文化景观的同时,邱华栋也常勾勒整体性的城市形态,形成全新的北京城市形象。与奇观化风景相伴随的是北京复杂多变的物化面孔:时而像脆弱不真实的沙盘城市;时而像不断扩张繁殖的恶性肿瘤;时而像欲壑难填的老虎机。这些物象并不是单一的,而总是指向一个更大的城市生命体,展示着多样又集中的形象。实际上,邱华栋小说关于城市奇观化的描述有很多内容是重复的,人与城市的纠缠也有诸多重写,显示出其小说的特征,即作品呈现出“符号化”,人和事的重复,恰恰是商业社会市场化城市景观的必然产物,刻画出消费时代“灵韵”消逝后的模式化生产及表面纷繁实则单一的物化形态。不论是对散碎的城市物质景观的描述,还是对城市现代性面貌的整体性刻画,都体现出邱华栋对北京城市奇观的深入书写和剖析。

二、邱华栋北京书写中的城市新人塑造及其文化涵义

与城市景观全新构造相一致,邱华栋塑造的人物同样是“城市新人”。这些人不仅与以往老派市民不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重构了与城市北京的关系。居伊·德波认为,“景观并非一个图像集合(ensemble d'images),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通过图像的中介而建立的关系”^{[8]4}。邱华栋通过一系列城市人形象的塑造及其荒诞的经历境遇,描绘了新的城市文化。

邱华栋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工作,经历了转型时期北京的巨变,见证了城市不同行业的兴衰起伏,这使得他能够感同身受地理解在北京打拼的青年人的喜怒哀乐,以及面对现实冲击和不确定生活时的身心困境。在这个意义上,的确可以说“邱华栋1990年代的小说世界与他的个人生活是互文的,彼此嵌入和扩张的”,他是“19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在场现实主义者’”^[10]。从个人体验出发,邱华栋在1990年代集中塑造了一批城市“闯入者”的形象,他们突然闯入城市,野心勃勃却又显得茫然无依,四处奔突却又始终陷在城市之网中缚定难行。吕安(《闯入者》)、林薇(《手上的星光》)、林家琪(《沙盘城市》)等城市“闯入者”大多漂泊无依,面临着生存现实和精神焦虑的双重挤压,他们从遥远的异乡闯入北京,逐渐适应并认同了城市法则,但似乎始终是这个城市的边缘群体,大多面临梦想和身份破碎的痛苦,结局不是疯狂就是死亡。邱华栋“闯入者”谱系中相当多的个体,实则是后来“北漂”“京漂”人物想象叙述的滥觞,这些人构成城市边缘人群,形成民间化个人化的文化空间,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北京独特的社会生态。

邱华栋对1990年代北京文学的另一突出贡献,是塑造了一大批“社区人——异化者”形象。邱华栋无疑是敏锐的,1990年代的北京,正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转型,其中一个重大变化是大量新式社区的出现,现代小区的建立及都市空间的分割,使得现代城市空间变成了生产和消费的聚合地,大量与以前熟人社会不同的城市社区人成为愈来愈明显的城市面孔。实际上,1980年代的“京味”小说已经出现了社区和社区人。不过,那一时期的社区居民多为“奇人”,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最后的老北京人”,他们在新式社区中痛惜老北京和旧民俗的“消逝”,感叹新楼房对胡同的“吞噬”,对鸽子、鸟群空间的“占领”。因而,在第二代“京味”小说作家刘心武、邓友梅的笔下,初入高楼社区的那批居民更多是以挽歌式的情感悼念着旧城的离去,无可奈何地直面新的历史变革。时过境迁,邱华栋所刻画在社区人,已然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存在,对资本、对现代城市空间的分割统治现状,至少在表面早已安之若素。邱华栋对社区人的态度也与1980年代时代变革中“京味”作家们在题材选择、情感态度、价值评判上有着巨大差异。邱华栋笔下的

社区人是生活在新空间中的人群,居住空间由胡同大院转向钢筋水泥堆砌的社区高楼。他细致描摹社区人的生活情态及生命状态,以直观又暗含批判的态度呈现出社区人异化的生存境遇和文化景观。流动性、陌生化、碎片感和异化,是社区人的共同特征。他们生活在商业消费社会中,既融入其中,又感受到荒诞社会的宰制。《时装人》《公关人》等作品固然受到卡夫卡等现代主义作家影响,但也显示出作家对新的城市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分析。同类作品《电话人》《鼯鼠人》《直销人》《钟表人》《化学人》《乐器推销员》等大多是漫画式描述,虽有些粗糙,但皆清晰表现出作家的城市思考。如邱华栋所述,城市空间、城市景观和城市境遇改造了现代人的生活和情感:“我发现城市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病,这当然是现代性病症,我开始关注城市病理学,我发现城市人可以加上很多定语:平面人、广告人、直销人、公关人、钟表人、电话人、电视人、化学人、持证人……于是我写了一系列的‘人’等系列小说,从城市病理学入手,由城市地理学转而进入了城市病理学讲述。”^[4]世界迈入工业化社会后,随着工业体系架构的完成,每一种产业都需要专门化的人才,所以说,专门化专业化的人源自产业分工和都市生活的需要。而诞生于城市的职业人也等同于工具人,在现代资本主义工业驯化之下很难不成为马尔库塞描述的“单向度的人”。

毫无疑问,邱华栋是借助这些社区人来展开对北京的观察和思考,从这个意义上看,邱华栋“最值得注意的文学史贡献在于他塑造了一系列的‘城市新人’形象。这些‘城市新人’身上折射出了现代都市生活、工业文明乃至后工业文明对人的侵袭、控制和异化”^[3]。在邱华栋形塑的城市中,那些淡定从容、恪守传统和礼节的老北京人不复存在,只剩下行色匆匆、焦虑压抑且面孔模糊不清的都市新人,他们是城市的“闯入者”、社区人和新兴的中产阶级。他们在城市中游荡生存,也改变了城市与人的关系。

《行为艺术家》是邱华栋思考当代“城市与人”主题的重要小说,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邱华栋探讨城市与人关系的典范隐喻文本,以往少有研究者注意。《行为艺术家》从表面上看是邱华栋一贯的对城市艺术家生活的观察和论述,闯入城市最终失败的情节在作家其他作品中也反复出现。但《行为艺术家》不同之处在于,它实则是1990年代转型时代文化思考的隐喻性表达,描绘了特殊历史时期北京的文化发展情态。作品讲述了“我”如何改造初入城市(北京)的少女黄红梅的故事,充分彰显出人与城市的缠绕共生关系。在“我”的帮助和刺激之下,黄红梅变成了一个城市法则的受益者,成为千万富翁,但最终在城市纸醉金迷的物化消费主义宰制下走向情感“坍塌”。值得注意的是,《行为艺术家》有一个互文的潜藏文本。在现代茅盾小说《创造》里,新文化运动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君实为塑造理想伴侣,展开对妻子娴娴的改造,最终却失去控制。显然,邱华栋重写了茅盾的“创造”故事,不同的是,茅盾试图思考“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冲击及其悖论,而邱华栋关心的则是现代都市文化尤其是商业文化对城市人的“规训”与“惩罚”,重新建构了一种全新的城市与人的关系。

三、邱华栋对北京城市文化意蕴的思考及其价值

城市景观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而“城市的发展,一定是以城市文化为内核,为动力、为主导的。城市文化不是简单的一种或两三种文化特征和文化产品,它是一个复杂的由内外多种因素相互渗透、纠结、制约和促进的构成体系”^[17]。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城市景观的叙述总是伴随着对城市文化的审视与建构,对都市的观察、思考和表现,对城市人群生存状态和生命形态的书写,最终完成对城市文化的整体形塑。

北京是有着伟大文学传统和文化传统的城市,这使得北京具有厚重的文化积淀,形成了稳定的城市文化风貌。但在1990年代初期甚至相当长的时期,有关北京的文学和文化形象很大程度上被“京味”和“京派”所框定,形成了虽丰富却不免固化的形象和内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

展,北京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北京城市形象和城市文化都面临着变革,原有的文化系统已趋向解体和崩塌,新的文化形态正趋于建立。邱华栋通过其持续性的城市书写,展开对北京文化意蕴的深沉思考,呈现和建构出城市化进程中北京当代都市文化面貌。

第一,北京文化的包容性特征。何为新北京?何为新北京人?如何去描述和呈现全新的北京形象?自199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当下,这些都是北京城市文化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谈及对北京人的感受和印象,邱华栋直言:“我真是觉得,在北京生活的各色人等,非常复杂、多元、有趣。由于这个城市的包容性极大,因此海纳百川,什么人都可以在这个城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18]164}因而在小说中,邱华栋才会反复叙述对北京的好感,夸赞着这个城市的包容和广阔,甚至包容性已经成为北京最值得注意的文化“景观”:“这座城市几乎能够包容一切,它容纳各种梦境、妄想和激情……一切对立的东西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存在并和平共处,互相对话、对峙与消解,从而形成了这座城市奇特的景观。”^{[11]2}当被问及为什么要写作《北京传》时,邱华栋坦诚地表示:“多年以来,我不断地积累着关于北京的资料,已经有两三百种。得闲的时候就在翻阅,一直在做准备。我是1992年夏天大学毕业后就来到北京工作,到今天已经二十八年了。二十八年生活在北京,不算短了。作为一个新北京人,我对北京一直充满着好奇和热爱,那么,给这座伟大的城市写一本‘传记’,也是我自己的小心愿。”^{[19]530}应该说,邱华栋一直在观察着北京,面对1990年代以来的北京,面对城市面貌和文化系统时刻都在发生巨变的现实,邱华栋用小说、散文和杂文,表达自己对北京尤其是北京城市景观和文化的理解,最终他以系统化的传记方式,写出对北京和北京城市文化的整体理解。在《北京人是外地人的天堂》一文中,邱华栋高度赞颂了北京文化的包容和多元化:

如果让我来形容北京的气质,我就用6个字概括:大气、多元、包容。就是因为它的大气、多元和包容,于是外来人容易站稳脚跟。我的印象是,最近一些年,北京越来越国际化与国内化了,它的具体表现是,出现了很多某国人的聚集区,也出现了国内某省份来人的聚集区,这就叫作国际化和国内化。……北京真是外地人的天堂啊!^{[18]136}

在不同题材、体裁的文学写作中,作家反复感叹北京这座城市巨大的包容性。在邱华栋笔下,都市北京总是带有传统北京的背景,北京书写总带有复调性,当代城市化的北京始终附着历史和过往,但不论“变”抑或“不变”,北京文学包容性的底蕴始终是北京城市文化的根本。

第二,北京文化的创新性特征。北京是一座特殊的城市,北京突出的文化特征是由历史与现实融合激发出的文化创新性。虽然邱华栋自1990年代以来描述北京在市场化改革中日益清晰的现代都市景观,但北京历史传统始终隐含在城市发展的背景中。邱华栋强调和认同北京的包容性,但他更为看重的是包容性背后映射出的文化交融和创新性:“我发觉北京比其他城市更宽容,更具包容性,其实这里几乎没有几个人是真正的北京人。那些满嘴京腔的人,只要上溯两代,他的祖籍立即就变成了外地人,……各个时代涌入北京的外来人给这座古老的城市带来了永久的活力,那是一种常新的液体,在城市之中涌动。”^[20]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传统和现代的交融,正是北京城市文化的显在特征,而城市之所以伟大,正在于北京的创新能力和活力:

北京这样一座三千年古城的道路还在扩展,更多陈旧的东西在衰亡,而新的道路也在建立,到处都耸立着胆大妄为的建筑。在这样新旧交相混杂的文化气氛中,有更新的因子在这里创造新的文化。这是一座古筝与摇滚交相混杂的城市,这种节奏让老年人在立交桥下扭起了秧歌,让年轻人像带电的肉体一样在午夜跳狂欢迪斯科。这就是北京,一条带着一千万个人的睡梦航行的大船,它总想把你带到太阳出发的地方。^{[9]94}

在有关北京城市文化思考的散文中,邱华栋论述了北京古今之间的重要关联,在他看来,北京作为有着几千年历史的都城,即使许多建筑都已经颓败坍塌了,但始终存在着一种称为“北京气质”和“北京精神”的精气神,使得它能够从“局气”走向开阔,从保守走向创新。

邱华栋的北京书写不仅注重北京文化中历史与现实的交互对话,更呈现其持续创新的文化生长性。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使得北京真正成为令人瞩目的全球性城市,但北京全球化的过程却并非一蹴而就,实际上,是从1990年代的现代性城市变革逐步延展而来的。北京融入世界,不仅是景观和城市面貌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景观背后文化内涵的融汇和发展,在小说《坏女孩》中,主人公“我”与刘晖有关于北京城市发展和文化形态的对话:

我给刘晖打了个电话,约他去吃意大利比萨饼。他好像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的一切特征都非常感兴趣。我们吃得非常愉快。走在灯光辉煌的北京的大街上,刘晖又像发现了什么宝贝似的说:“看,那里又立起了一个巨大的m形字母,麦当劳又一家快餐店开业了,后殖民主义文化席卷北京!”

我说:“不,你错了。人类已经进入人类共享文明时期,凡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好东西,我们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共享。像各种外国美食也一样。所谓后殖民主义文化不过是一种幻觉罢了。”^[21]

这显然也是作家对北京文化发展的基本理解。与1990年代经历“人文精神失落”及其讨论的其他作家不同,邱华栋对发展中的现代文化抑或后现代文化并未表现出对所谓“人文精神失落”的困惑与隐忧,也没有展开对伴随全球化而来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反思与批判,与之相反,作家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融表现出明显的认同和谨慎的乐观。如作家李洱所言:“邱华栋还提前认同了消费主义,或许是中国最早肯定消费主义的小说家。”^[22]在邱华栋看来,北京作为历史上无数次经历文化冲击和文化交融的城市,它的包容性、创新性和发展能力无与伦比,这座多元的城市有能力消化一切新鲜的事物,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的文化组成部分。正如研究者在评述邱华栋北京文学书写的集大成者《北京传》时所指出的:“《北京传》不仅仅是一部展现北京城发展的全景书写,也是一部作家个人的城市观察记录,它融合了宏观架构与微观体验,汇聚了民族历史和人物想象……五方杂处、民族融合是北京城千年历史的常态。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城展现出帝都的宽广胸怀,包容吞吐着世界各地的人民和文化。北京城的代表色‘高级灰’正象征着北京城含蓄包容、低调内敛的城市文化。如今的北京城,正以‘内灰外彩’的城市文化走向世界舞台……邱华栋作为小说家的城市体验和文学想象,赋予了《北京传》不同于城市史研究著作的文学叙事品质。”^[23]从1990年代对北京东三环周边都市奇观的缤纷呈现,到新世纪对北京历史文化的系统审视,对北京城市文化生长性的持续思考,或隐或显就在邱华栋的城市书写之中。

纵观邱华栋漫长的创作生涯,或许可以说,他所有的观察、思考、想象和描述都在呈现北京,反映北京文化的生长变革,他“真正想要深思熟虑的,不是人与城市交战的故事,而是人与城一道变化的过程”^[24]。作为参与北京城市文化建构中的一分子,邱华栋曾感慨:“北京已经存在了三千年,如果三十年算一代人,那么都过去一百代了。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努力地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城市文化和记忆。”^{[19]534}从这个意义上说,邱华栋既是城市景观的描述者,更是表达和思考北京文化的哲人。

参考文献

- [1] 陈晓明. 异象纷呈的小说世界:邱华栋小说一瞥[M]//邱华栋. 邱华栋精选集.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

- [2] 张钧. 小说的立场: 新生代作家访谈录[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146.
- [3] 史建国. 速写“城市新人”: 邱华栋小说与 90 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J]. 当代作家评论, 2021(6): 79-85.
- [4] 邱华栋. 我的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病理学以及其它[J]. 南方文坛, 1997(5): 43-44.
- [5] 张东. 一种严肃守望着理想: 邱华栋访谈录[J]. 南方文坛, 1997(4): 56-62.
- [6] 徐阿兵. 一个作家的诞生: 重读邱华栋 20 世纪 90 年代的小说[J]. 新文学评论, 2021(2): 79-85.
- [7] 刘大先. “月亮的朋友”: 邱华栋与 1990 年代[J]. 当代文坛, 2023(2): 95-102.
- [8] 德波. 景观社会[M]. 张新木,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 [9] 邱华栋. 城市战车[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
- [10] 何平. 新生代: 文学代际或 90 年代的文学年轮: 作为“新生代”的邱华栋[J]. 当代作家评论, 2021(6): 67-78.
- [11] 邱华栋. 手上的星光[M].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 [12] 邱华栋. 花儿花[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 5.
- [13] 邱华栋. 城市中的马群[M]//邱华栋. 邱华栋精选集.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4.
- [14] 邱华栋. 哭泣游戏[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7: 196.
- [15] 费瑟斯通.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 刘精明,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165.
- [16] 刘心武. 邱华栋. 在多元文学格局中寻找定位[J]. 上海文学, 1995(8): 73-79.
- [17] 陈宇飞. 文化城市图景: 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问题研究[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2: 9.
- [18] 邱华栋. 城市的舞蹈[M].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 [19] 邱华栋. 北京传[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0.
- [20] 邱华栋. 行为艺术家[M].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34.
- [21] 邱华栋. 坏女孩[M]//邱华栋. 邱华栋精选集.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4: 244.
- [22] 李洱. 邱华栋与他的小说[J]. 当代作家评论, 2021(6): 56-59.
- [23] 唐诗人, 任旖然. 城市生命体的历史与想象: 论邱华栋《北京传》[J]. 东吴学术, 2022(6): 94-99.
- [24] 陈若谷. 1990 年代: 从城市书写到城市文学: 以邱华栋的北京书写为例[J]. 当代文坛, 2023(2): 116-122.

Urban Landscapes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On Qiu Huadong's Writing of Beijing

BI Ha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Qiu Huadong's urban literature has achieved its most prominent accomplishment in portraying the new Beijing city and new Beijing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urban society. From vivid portrayals of Beijing's urban spectacles to in-depth reflections on its historical culture, Qiu has constructed a comprehensive literary portrait of Beijing amid temporal shifts through nearly three decades of city-centered writing, thereby forging an integrated narrative of the city's cultural connotations. He is not only a recorder of urban landscapes but also a thinker who interprets and reflects on Beijing's cultural essence.

Key words: Qiu Huadong; urban landscapes; cultural connotations; Beijing writing

[责任编辑: 王建霞]